

海外视野

慕课无法撼动当下传统的高等教育,与他们所提供的课程本身无关。如此一来,人们就不得不问:既然如此,那么网络教育与传统高等教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网络教育怎样才能真正改变高等教育

郭英剑

3年前,人们似乎都在期盼着,网络与技术将改变高等教育。3年过去了,现在的情形怎样呢?

这是“新美国基金会”教育政策部主任凯里在新近出版的《学院的终结:缔造学习的未来与无处不在的大学》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2012年被《纽约时报》称为是慕课之年。凯里说,2012年初,来自哈佛、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一些顶尖科学家分别开办了三家公司来提供慕课,这些课程全都是免费的,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在网上注册学习,被人称为是高等教育的一场革命。

但是,3年过去了,情况去不尽如人意。传统的高校报名人数依旧人涌如潮,大学生依旧必须为高等教育支付高昂的学费,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人们都有目共睹。

在凯里看来,慕课无法撼动当下传统的高等教育,与他们所提供的课程本身无关。这些课程从质量上来说,即便不说他们高于传统的高校课程,起码也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如此一来,人们就不得不问:既然如此,那么,网络教育与传统高等教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当然,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在询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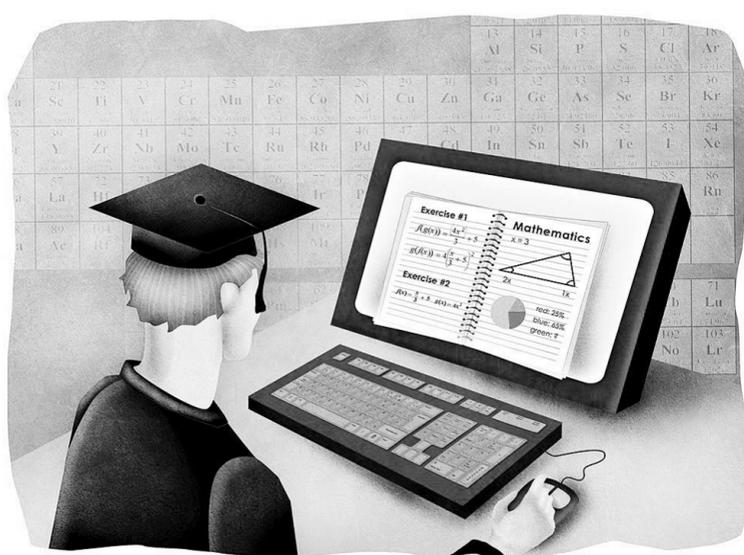
传统大学的价值何在

当然,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前,一个可以算得上眼见为实的事实是,慕课以传统的高等教育无法相提并论的价格,向大家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大学教授所讲授的课程。

为什么网络课程未及如人意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网络教育无法向人们提供正规的大学文凭和学位证书,而正是这些文凭和证书,使人可以获得一个工作岗位。从这个角度讲,大多数人之所以乐意支付高昂的学费上大学,就是为了这个文凭、学位和工作。或许,这就是传统的高等教育的价值所在。

现在,信息技术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向高校的大学文凭和学位发起挑战。在凯里看来,一旦发起挑战,那么,现有学术体系之下的经济基础将会发生剧烈动摇。

就传统意义而言,大学文凭有几种不同的含义。首先,一流大学把新生入学看成锦标赛,凡是能够获得入学资格者都是最好的学生和最



图片来源: www.quanjing.com

优秀的学生。这也就是说,凡是获得入学资格者,都是聪明智慧之人。在这个意义上,“哈佛的辍学生”和“哈佛的毕业生”具有同样的价值,因为他们都是优秀之人,在人才市场上,人们几乎可以同等地看待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因为优秀才得以进入了哈佛。

大学文凭的意义还在于,一个人选修了大量的大学课程——一个学士学位意味着你选修了超过120个学分的课程。学生要想毕业,就需要一个专业中的部分高低不等的学分,或者理学与人文学科的少数课程。

学位证,现代社会的敲门砖

读了大学,获得了大学文凭还不够,还要进研究生院才行。而在19世纪,原本是不需要这样的。那个时候,只要人们对法律感兴趣,就可以直接进

法学院。直到艾略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之后,改变了这一格局,提出要进入哈佛的研究生院或者专业学院,大学本科文凭是先决条件。随后,其他高校跟进,这就演变成了一种惯例。

更重要的是,传统高校的大学文凭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政府用人的一种规则与标准示范。人们并不在乎你是否是一位好老师——只要你没有学士学位,对于公立学校而言,雇佣你就是违法之举。对于私立学校而言,查看一个人是否具有大学文凭,已经成为再简单不过的选人方式之一。在凯里看来,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过是看你是否选修过120个学分的课程而已。

网络教育如何才能给高等教育致命一击

当下,免费的网络课程怎样才能起到一种

革命性的作用呢?那就是建立一套相近的体系,而这套体系可以摆脱传统高校的控制,向人们提供免费的或者是低价的证书,进而让人们找到工作。在凯里看来,当代的技术革新者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魔斯拉基金会,即火狐网页浏览器的制作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一项名为“公开的徽章”的项目研发。所谓“徽章”,是指所有机构、高校都可以颁发的一种电子证书。而这种徽章意味着特殊的技能和知识,有相应的链接可以证明这个徽章是如何得到的,依据何在。

包括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内的传统高校,都在尝试着发放类似的徽章。而其他一些类似的教育机构,也在做同样的事。

这个并不起眼的徽章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人们并不在乎你是在哪个大学学到的这门技能,也不在乎它属于哪所大学的“独门绝技”。你可以终生学习,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在教室中学习。学习之地可谓无处不在。

慕课的供应商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并且已经开始颁发证书了。凯里说,自己在2013年,完成了一个学期麻省理工有关遗传学的课程,并向人们展示了自己所获得的证书。而这样的证书,已经获得了一些传统高校的认可。

在凯里看来,这种开放的证书体系允许人们自由地将信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他们要到大学中去学习什么,要在另外的地方去学习别的内容——然后将这些东西都直接展现在未来的老板面前。以现在在西方非常流行的LinkedIn为例,该公司不断地在为消费者提供各种工具,进而让人们可以详尽地描述个人的情形,也可以不断地对自己的状态加以补充和说明。与之相比,大学文凭则难以言说,也无法改变。

长远来看,慕课无疑将是改变高等教育的重要一步,但只有学生和学者有机会获得电子证书——这无疑是在当代世界的衍生品,慕课的作用与影响力方能真正地显现。

换句话说,当人们能够从慕课等网络教育中获得大家普遍认可的证书时,高等教育的危机,就真的到来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记者快评

高校更名切忌无利不往

温才妃

一份《2015年高校更名通知》近日在网上流传,“XX师范学院”更名“XX大学”,“XX农林大学”改叫“XX科技大学”……听起来瞬间“高大上”。

然而,3月10日,教育部证实了这份名单公布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通知》中部分高校的更名传闻已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为什么时不时总会有更名的消息爆出?因为对于高校而言,更名绝对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简单地理解,高大上的校名能吸引更多优质生源、用人单位,在招生季,就更容易爆出更名,会是很好的广告宣传。再往深处想,“学院”变“大学”,行政等级由副厅级变为正厅级,在师生人数、科研经费、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硕士点数量上均要上一个等级。对于名声不响的大学、学院而言,何乐而不为?

然而,即便行政部门鼓励高校吃成“胖子”,高校也愿意向“胖子”方向发展,但它自身的“健康”如何保证呢?一些高校在去“农林”“钢铁”“师范”过程中,变成了综合性的“四不像”;一些高校在合并、更名过程中,校名中的“医学”“机械”“船舶”特色被埋没。千校一面问题由此日益严重,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自然要落人下风。

“大而全”的反义词是“小而精”。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坚持小规模办学,将其优势学科做到世界顶尖;麻省理工学院为综合性大学,但却坚持突显“理工”优势,最后它们都以“学院”之名让世界瞩目。而在中国,尽管大家都在谈高校内涵式建设,走有特色、高水平的建设之路,但是,甘心放弃资源争夺、保持现有体量的高校甚少,追名逐利反倒成了大势所趋。

当然,鼓励高校不更名,沉下心来办出特色,却在行政级别、资源配置上予以薄待,自然也是做不好的。行政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取消学院与大学的行政差别,让学院里的校领导、教授们在心理、待遇上不会自觉低人一等。另外,在更名指标的配置上,也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而非像“点名”一样,由师生人数、硕士点数量、科研经费的多寡决定其升级与否。

一个好名字,固然能给人留下较好的初始印象,但对一个人的评价,则来自于他为人处事中的点点滴滴,而当这个人的品质足以征服世人时,他的名字就成了某种品牌的代名词。人是如此,高校更名也是如此。

高教观点

硕士论文难取消背后的法律问题

熊丙奇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陈英旭指出,硕士教育基本上是两年半,有半年要找工作,再加上寒暑假,真正学习和做科研的时间不到一年。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他做科研,让他出学位论文,势必会影响学术质量。能否考虑硕士生不要做论文,就让他专心学习和搞科研。教育部人士对此回应:“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研究,但是现在不敢做。”因为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研究生是课程和论文研究并重的,特别是论文,所以这个问题,现阶段没有办法解决。

舆论就此讨论硕士生有无必要撰写论文。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这一问题要害。讨论的结果,无非是有人赞成要写,有人反对写,或者学术硕士要求写,专业硕士可不要求写。在笔者看来,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大学是否有权力,根据本校的办学定位,对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提出个性化的培养要求——有的学科、专业需要撰写论文,有的学科、专业不需要撰写论文。

高校已经意识到对硕士研究生提出一刀切的论文要求并不合理。一方面,有的学生根本没有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就被要求产出学术成果,结果是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为完成规定的论

文撰写,发表要求,有的学生甚至造假、抄袭,做论文买卖交易,催生学术不端,而由于学校也意识到论文的要求不合理,因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有些研究生培养应关注学生的应用能力,一味重视“学术研究”导致培养定位偏离,也会造成教育和人才浪费。

国外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就不都要求获得硕士学位撰写学位论文,更不会要求硕士生研究生在求学期间撰写并发表学位论文。专业硕士(课程硕士)只需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即可毕业获得硕士学位,而准备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可自主选择在学习期间发表学位论文。

可是,国内高校却对调整论文要求无能为力。其原因在于,我国《学位条例》第五条规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硕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硕士学位……”因此,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授予硕士学位的“法定”条件。如果这一条文不修改,高校就不能调整对学生的培养要求。多年前,就有教育人士提出,取消MBA、MPA学生的论文要求,可却受

到现行教育法规的限制。

为此,应该加快启动《学位条例》的修订。政府应着力解决高校缺乏自主授予学位的权力问题,通过赋予高校自主授予学位的权力,全面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自主招生、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自主开展教育教学。在自主办学、自授学位的办学环境中,每所学校将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制订培养标准,不应简单地以发表论文、撰写学位论文来培养质量把关,而应重视培养过程,加强过程监督和过程淘汰。比如,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强调每一门课程的质量,而不是应付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评价学生是否达到本校的质量要求,并淘汰不符合要求者。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深化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改革、高等院校综合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化高等院校综合改革,是促进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必然选择,而要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必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做到“于法有据”,这就需要修订现行法律,为高校综合改革拓宽空间,并保驾护航。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高考改革难在“文化情结”

邢海燕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30多年历程,从经济领域到教育领域全面铺开。以群众最为关心的高考改革为例,打破文理分科、异地高考新策、英语改革等改革措施相继登场。与种类繁多的改革新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高考改革似乎总是停留在“旧瓶装新酒”的尴尬境地中。教育改革的本源在于对于教育理念的改革,高考改革难,其背后是浓重的“文化情结”。

美国高校招生考试中,社会机构负责组织考试,高校负责自己的录取标准,政府负责服务与研究。这样的分工平衡了各方力量,在整个的过程中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监督。把考试交给社会机构,这在中国是一件谁都不敢想的事情,政府不敢放权,民众不放心放权,高校不敢要权。我们的改革就在这种扭扭捏捏的态度中走得小心翼翼。社会力难以涉足我国高考,其背后是文化情结的斗争。“至公”的文化基因压在头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文化心理下,我们对于人情、不公平是怕极了。但是,维系中国社会的好人缘是我们的“人情”。这样的矛盾烙印在中国社会的改革中,一方面我们的改革力求公平,另一方面

我们不信任“公平”,因为在我们的认识中,在人情繁密的中国,做到“六亲不认”恐怕不是一件易事。再比如,高校自主招生推行难的问题。“千校一面”素来为人诟病,但是国内高校在探索自身特色的道路上走得也是畏首畏尾。中国古训素来不喜张扬,虽然敢为天下先值得称赞,但是君子毕竟都是走中庸之道的。什么是中庸?是不温不火、委婉含蓄、深藏不露。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高等教育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走出自己的道路。畏首畏尾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胆怯。古语云:“枪打出头鸟”,张扬个性自古以来不是中国文化的追求。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因子,深刻地影响了高校。

再举一例,那就是绕不开的应试教育问题。求学上进本是好事,但是错就错在,我们从求的就是学习的“果”。古代学有成,可以做官,可以光耀门楣;在现在,学有成,可以读名校,可以在就业市场中自信昂扬地说自己“出身好”。什么是学有成的评判标准?分数!所以即使应试教育被批判多年,但仍然扎扎实实地存在。

实际上,学习与借鉴他国模式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考试招生制度就是最好的。这折射

了国家发展间的差距,尤其是在现代理性发展上的差距。法制与人情的斗争显示了我国的现代理性走到了哪一步——文化素质不高,民众理性未普及,法制还未健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是不能做到自由与自主的。然而,这并不是否定现有的全部,毕竟我国在历史上落后太多,进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尚需时间。在教育改革上,深受文化情结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我们是学不到的,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推进文化建设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作者系厦门大学研究生)

域外传真

佐治亚在他们的心中

曾经,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梦想着上美国名校哈佛大学。一个怎样成为哈佛女孩的指南——《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为全国畅销书。作者是哈佛大学一名成功申请者的父母。与哈佛相比,美国亚特兰大的一所名牌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对中国人来说知名度并不高,但这种情况正在快速变化:申请上佐治亚理工学院的中国人数量近年来激增,从2007年的33人增至2014年的2309人。有些申请者来自中国最好的学校,并且所有人都做好了支付约4.4万美元(一年的学费、住宿费)的准备。这笔钱相当于中国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可支配收入的近10倍。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学生的雄心正在转变:他们不再只被闪闪发光的校名吸引,追求国外优质教育正在成为其目的本身。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远比亚佐治亚理工学院知名度小的大学正在获得好处。2012年至2013年,超过80万中国人到外国学习,接受各级各类教育。在这两年里,他们占到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0万出国留学总人数的1/4以上。2013年年底,近110万中国人正在国外留学,是前10年的3倍多。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高等教育最大的输出生源国,其份额正在急剧上升。至少从2009年开始,中国不仅给发达的、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提供了大多数学生,而且给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芬兰、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国家提供了无数学生。

中国学生在美国上学的热潮尤为引人注目。2013-2014学年,超过11万名中国学生被录取为美国大学的本科生,是2006-2007学年的11倍。如今,他们占有所有外国本科生的30%。据国际教育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013-2014学年,美国各类高等教育中的中国学生总人数为27.4万,是2006-2007学年的4倍多。相比之下,中国本科生在英国大学的人数仅有3.5万。

与此同时,中国家庭正在早早地把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学习,并与他们一起移居美国。2013年,大约3.2万名中国学生获得在美国中等学校学习的签证,而2005年仅有639人。不过,自2010年以来,18至22岁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急剧下降——从当时的12.1万人降至今年的8.9万人。

几个融合的趋势导致了上述结果。一个趋势是,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2011年,近2.5万名中国学生就读于美国高中,这个数字是2000年的两倍多。在最近几年美国大学扩招的驱动下,本科生的数量猛增,导致教学质量不佳,仅少数优秀的大学保持了几千人的招生数。

另一个趋势是,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财富,更多的中国家庭能够承受送孩子出国的经济压力。与国内的二流大学相比,他们更青睐评价高的海外大学。这种选择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在许多方面过于死板、压抑。加之,全球国家更加开放。对中国来说,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习签证也更容易获得。

热衷于录取自费中国学生的美国大学,已经通过游说美国政府来发放更多的签证。他们派团队到中国最好的中学鼓励申请人。而且,一些美国校园已经开设了帮助中国人提高英语水平的课程。

很早就计划把孩子送往国外的家庭,可以把孩子送到政府资助的学校上私人课程。这些一年花费高达10万元人民币(1.6万美元)的课程,帮助学生准备美国大学的人学考试。为他们提供这些课程的学校包括一些精英学校,如北京第四中学和北京八一中学。根据总部位于上海的胡润公司的报告,4/5中国最富有的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最想送他们的孩子出国留学。

他们将熟悉尖端的技术和西方的商业运作模式,急于培育受过国外教育的人才的中国政府有理由鼓励这一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前往海外留学的人数一直在迅速增长,但是回国人数的增长速度更快——经济蓬勃发展的就业前景吸引了他们。2013年,超过35万中国人从海外留学回来,而10年前仅仅只有2万人。他们几乎占了1978年以来140万回国总人数的1/4。由于回国的人数太多,就有了一个对他们当中无法找到工作的人的贬义词——“海待”(从国外回来并等待就业)。

未来,出国留学人数的增速可能难以维持在这么高的水平。2008年,中国大学适龄人口的数量已经开始萎缩,到2021年18至22岁大学适龄人口将比现在少2000万人左右。而且,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败运动已经瞄准了送钱和送家人到海外的官员们。

尽管经济放缓,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还将继续快速增长。据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与10年前相比,2020年中国城市地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还会翻倍。同时,出国留学的梦想在不少中国家庭里更加坚定。(胡乐乐编译)

